

回鹘汗国与中原商业贸易探微

黄 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回鹘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汗国时期,由于回鹘畜牧业的发达、唐朝经济的繁荣以及开明的民族政策,回鹘与唐朝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着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并从中获得了可观收益,但其经营手段尚存有游牧民族的野蛮,唐王朝以其宽容开放的态度妥善经营,与少数民族建立了和谐关系,推动了民族融合和发展。

[关键词]回鹘;唐王朝;商业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8-0015-03

回鹘(回纥)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史记·匈奴传》中称为“丁零”,游牧于贝加尔湖与中亚巴尔喀什湖之间的辽阔草原。公元4世纪时又被称为“铁勒”,因为他们的车轮高大,也被称为“高车”,先后受柔然和突厥统治。回鹘为铁勒族的一支,是南北朝时期高车六氏之一的袁纥氏的后裔。7世纪初,“(突厥)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袁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袁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自此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公元630年,回纥与薛延陀联合攻灭东突厥汗国,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杀薛延陀部多迷可汗,尽收其地,自称可汗,并表示臣服于唐。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攻杀后突厥颉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建牙帐于鄂尔浑河上游,回纥汗国建立。次年,后突厥汗国白眉可汗被回纥攻杀,后突厥汗国灭亡。这时的回纥“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成为大漠南北新的盟主。公元788年,回纥可汗上书唐德宗,“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鸢犹鹘然”,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

回鹘汗国存在的百年间,基本上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虽然也曾出现过冲突,但主流仍是睦邻友好,从历代可汗继位接受唐王朝的册封、回鹘汗国两次助唐平乱、唐三次下嫁公主于回鹘可汗等事可见一斑。但更普遍、持久的联系则是回鹘与中原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回鹘为游牧民族,“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游牧经济的特点使其自身具有商品交换的需

求,他们迫切需要以自己的牲畜和畜产品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统治阶层也对异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颇感兴趣,这就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契机。同时,回鹘汗国发达的畜牧业、唐朝繁盛的经济和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唐与回鹘多渠道的贸易经营共同促成了回鹘与唐朝持久而繁荣的商品贸易。

一、回鹘发达的畜牧业

回鹘汗国的建立,摆脱了突厥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得以协调发展汗国内部经济。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在百年间得到了空前发展,广阔的疆域和水草丰美的草原使作为传统经济的畜牧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养马业。如回鹘屡次助唐平乱时,全部派骑兵参战;回鹘与唐朝互市中,每岁动辄以马数万匹易绢帛。如德宗时武义成功可汗为迎娶咸安公主,纳聘马2000匹;穆宗时崇德可汗为迎娶太和公主,纳聘马2万匹、骆驼1000只。由此可见畜牧业的发达,特别是养马业之盛和马匹数量之多。回鹘在满足自己生产、生活需要之外,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数量的牲畜特别是马匹作为商品来换取唐朝的丝绸、茶叶等物品。唐朝为加强国力、装备军队,也需要大量的军马。由此双方进行商品贸易,尤其是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回鹘与唐朝的商品贸易是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交易。

二、唐朝繁盛的经济和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盛世,唐朝社会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为历朝历代所无法

比拟。在当时世界,中国处在发展的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是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的10~20倍。手工业更是处于世界先进地位,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丝绸之路被传到了世界各地,欧、亚、北非各国难望中国之项背。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更把唐朝变成了国际商业中心。中唐以后,“工商杂类,不得预与士伍”等禁令松弛,意味着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施,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商业贸易更加蓬勃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大都会,西域以及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往经商频繁,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自唐代,民族进一步融合,开明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唐太宗以“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处理战败的民族和政权。建立羁縻州府联络边疆民族,实现了对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控制。另外,唐朝统治者还对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册封,与少数民族实行友好的和亲政策。这些都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融合,这一时期各族之间的战事较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成为主流。回鹘与唐朝关系密切,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在漠北推行州府制度,以回纥部设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后突厥汗国兴起,铁勒各部再次遭突厥贵族奴役。回纥、契苾羽、思结、浑等部在唐允许下,迁至甘、凉间居住。回纥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建牙帐于乌德犍山与温昆河之间,被唐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天宝四年(745),怀仁可汗攻灭后突厥汗国,尽收突厥故地,成为漠北强国。此后回鹘可汗继位都要经过唐朝册立。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两次派兵助唐平乱。唐朝从至德二年(757)起,每年送回鹘绢两万匹,作为酬劳,回鹘每年运送几万匹马,换取内地的绢、茶。这些丝绢、茶叶,回鹘除部分自用以外,很大一部分转手远销于中亚,这使回鹘商业空前活跃,对回鹘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三、唐与回鹘多渠道的贸易经营

回鹘与唐朝的大宗贸易都是政府间的官方贸

易,以“朝贡”和“赏赐”等名义进行。唐朝在回鹘地区辟驿道,设马市,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茶马贸易。《新唐书》记载:“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可见数量之大。茶马贸易虽不如绢马贸易规模大,但仍是一笔很重要的交易。对尚茶成风的回鹘人来说,茶叶为生活必需品,所以“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除了自己享用以外,剩余的部分还可以高价转售于西北少数民族和西方各国,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

回鹘商人的经营也十分重要。回鹘地处丝绸之路沿线,来往商旅、使者络绎不绝,回鹘人从粟特人那里学到了经商之道,有时自行经营,有时通过粟特人之手进行转手经营,有时同粟特人合作经营。回鹘商人十分精明,他们会鉴别珍宝的成色、真假,而且还善于做牙侩,对买卖双方的货物品种、数量及价格进行商谈和撮合。他们频繁活动于中原与漠北之间,除了贩运和销售东西方各种货物外,有的还在长安开设店铺、放高利贷。这些回鹘商人和胡商、蕃客一样,进入中原后在长安居住经商,成为富商巨贾。

此外,回鹘汗国和唐朝的官吏利用出使的机会,进行私人贸易者也屡见不鲜。如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秋七月,回鹘可汗养子药罗葛灵入唐,就私带大量马匹出售,换取了“市马绢七万匹”的高额收入。又如唐贞元年间(785~804),咸安公主下嫁回鹘武义成功可汗时,德宗命关播为正使,赵憬为副使,率领使团护送公主,使团成员“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人数众多的使团,不走私牟利的只有赵憬一人,可能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官吏利用出使之便经商获利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回鹘与中原的贸易交换中,回鹘获取了巨额利润,与唐朝相比,更能从交易中获取更大的价值。首先,回鹘与中原的绢马贸易中有勒索的成分存在。回鹘的马匹价格很高,但有的马质量很差,枯瘦无力,不能耕田,更不能作战。有史书记载:“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缣,马皆病弱不可用。”^⑩“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弩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絶于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⑪可见回鹘在绢马贸易中占尽了便宜,唐朝皇帝也视为负担。其次,回鹘依靠丝绸之路

的便利进行转手贸易。在同中原贸易中获得的大批丝绢、茶叶等货物中,回鹘人留够自用的部分后,剩余的就转手高价卖给西北少数民族和西方各国,由于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使者络绎不绝,回鹘人就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当起了中转商人,获利丰厚。最后,回鹘利用助唐平乱、索要马价等事宜掠夺中原大量人口和财产。回鹘曾两次助唐平乱,收复了两京,但这也成为回鹘居功自傲、胡作非为的借口。回鹘助唐收复东京后,大掠三日,府库储藏被洗劫一空,百姓流离失所。待平乱后,在长安城居住的回鹘使者也达到上千人,县官每天要供给他们食物,而这些回鹘人“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⑬“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⑭回鹘可汗便屡次因索要马价而勒索唐朝大量的锦帛和钱财。

在回鹘与中原的贸易交往中,回鹘获得了更多

的经济利益。游牧民族学会了种植庄稼、建筑房屋,西迁后的回鹘仍然与唐朝和中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也为东西方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并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唐朝宽容开放的大国风范吸引了包括回鹘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和亚欧许多国家的使者和商人,促进了各民族及国家的交流和融合,使中国的丝绢、茶叶、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等远播世界各地,也使异域珍奇、佛教、医药、艺术等传入中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埋下了多姿多彩的历史宝藏,成就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唐朝在经济利益上对少数民族是宽容的,甚至是纵容的,但在长久了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无不对中原的高度文明所折服。这种开放和谐的民族关系,多种文明的交流传播、吸收发展,可能才是其中最大的意义。

[注 释]

欧阳修:《新唐书》卷 217《回鹘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111 页、第 6114 页、第 6124 页。

刘昫:《旧唐书》卷 159,《回纥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95 页、第 5211 页、第 5210 页。

刘昫:《旧唐书》卷 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089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3《唐纪》9,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340 页。

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52 页。

欧阳修:《新唐书》卷 150《赵憬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811 页。

欧阳修:《新唐书》卷 50《兵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339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4《唐纪》40,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773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5《唐纪》41,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789 页。

欧阳修:《新唐书》卷 51《食货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348 页。

⑪樊保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⑫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中国博物馆学会丝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兰州成立

2010 年 9 月 4 日,由甘肃省博物馆发起、全国 40 余家博物馆参与的中国博物馆学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甘肃省博物馆召开。该专业委员会将整合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的力量,加强丝路沿线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力求促进丝路沿线博物馆事业及其相关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柏参加了成立大会,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裕昌当选为秘书长,甘肃省博物馆馆

长俄军当选为主任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黄鲁闽等 48 人当选为常务委员,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甘肃省博物馆。

作为中国博物馆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将建立全国丝绸之路沿线各博物馆信息中心和网站,构建各馆之间了解与交流的平台,同时还组织丝路沿线博物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高丝路沿线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和整体水平。